

白牆與粉筆灰：記新書分享會

記新書分享會



撰文\江映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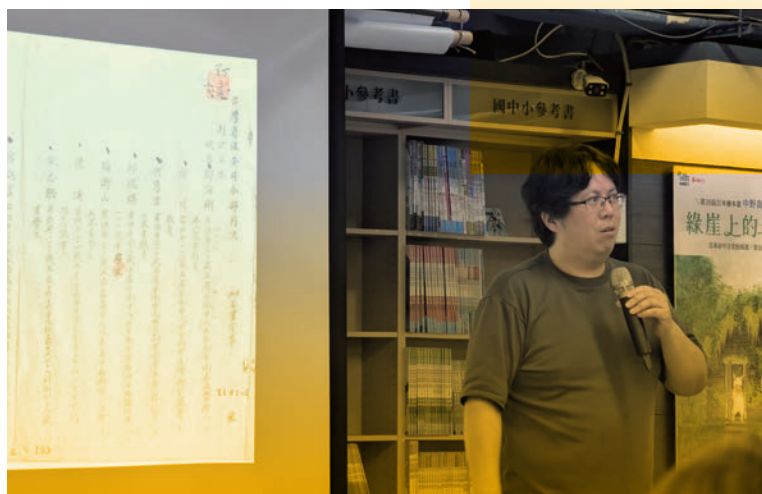
《白牆與粉筆灰：探索臺南校園政治案件》是中山大學林傳凱老師的新書，也是國內第一本系統性盤點戰後臺南校園政治案件的專書。從幾年前出版的《無法送達的遺書：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》，我才開始注意到「歸還遺書運動」，以及林傳凱老師和幾位作家學者在保留、研究這段歷史記憶的努力。即使對白色恐怖時期歷史並不算陌生，也知道轉型正義對台灣是極為重要的事，但對於故事細節、檔案、受難者身份背後的脈絡，還是容易模模糊糊，久了難免擔心是否自己加入了太多臆測和刻板印象，或是不小心人云亦云，好在拜這些埋首研究以還原真相的學者作家，持續出版和推廣之賜，得以讓我們在理解、反省時能有所據，不會流於只是「憑感覺」。

校園政治事件和其他的白恐時期政治事件有什麼不一樣？台南的案件又和其他縣市有什麼異同？當初

在社群上滑到這本新書出版的消息時，我的確冒出許多好奇的問號，覺得也許透過認識這本書，可以更貼近這個我已移居二十年的城市，於是在9月27日晚上走進政大書城，現場已經有二十來位民眾等待分享會開始。有一點可惜地，我發現似乎仍是中年以上的朋友居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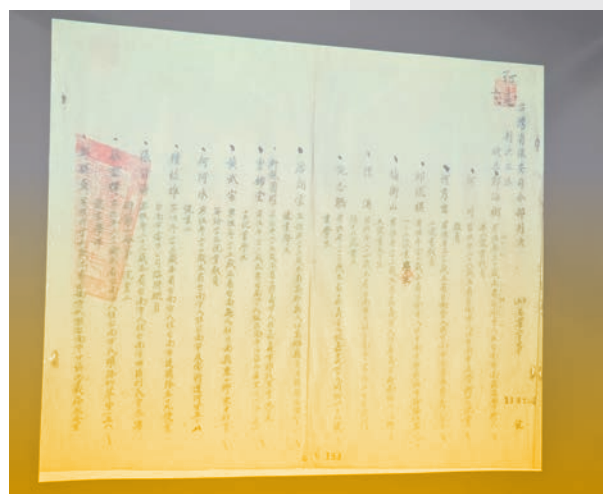
分享會一開始是由出版社編輯介紹新書的封面設計，書中每個事件的受難者姓名，都以打凸的方式呈現在封面上，乍看不會發覺，但伸手觸摸便讓人心一驚，密密麻麻，一個名字接著一個，即使曾經在歷史上看似被遺忘，但他們一直存在。銀灰色與白色相間錯落的直條紋，既拼出校舍、法庭的樣貌，又似監獄的鐵欄。

有別於二二八事件中，許多受害者未經審判即遭祕密處決或刺殺，造成大批失蹤案例，1949年至1990



年初期，被稱為「白色恐怖」的這段時期，被交由軍法審判、入監或是處決者，大多留有較為完整的檔案。隨著近年史料逐漸出土公開，截至2025年3月底，檔案局已經徵集了大約2932公尺長的政治檔案，其中包括政治案件檔案、監控檔案、情治機關內部會議和人事規章檔案等。除了能更接近史實地做統計數據之外，從監控檔案中也能看到，那些不在受難者名單中，卻實質而長久地被監視、排擠，飽受恐懼無法發聲的家屬親友，尤其是那些留下來的女性。近年有越來越多研究關注政治案件下的女性家屬創傷和女性觀點，相信這些檔案的出土也提供了相當大的佐證協助。

在進入正題之前，林傳凱老師特別提醒，不是只有菁英才是受害者。過去我們因為電影、戲劇、名人故事等影響，容易有一種印象，彷彿受難者都是醫生、律師、老師、各界菁英，然而這並不是專屬高知識份子的被迫害史，軍事法庭上，還有更多農民、工人、漁民、小商人，政治犯的職業類別，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多元。至於這本書的主題台南校園政治案件，林傳凱老師先說明了書中案件的四大類型：一、左傾或地下組織案件；二、外省籍教師



的「潛匪」案件；三、「言論入罪」的案件；四、台獨運動與其他思想案件。其中「言論入罪」大概是我們最熟知的，也或許是校園中最容易出現的，無論是透過官方審查還是俗稱的「抓耙仔」，多說一句話、多寫一封信，都會成為叛亂的證據，尤其是讓學生作證指控老師，破壞了校園中的師生互信關係，其實也造成許多當年的學生日後長期的陰影。



林老師也提到，這些政治案件受難者，的確有不少是認真加入左翼組織，具有共產黨員身份，企圖以武力對抗政府者亦大有人在，並非我們原本可能過份天真的想像裡，絕大多數都是被誣告、陷害，頂多開開「讀書會」，而「冤枉」入獄或遭到處決。過去總時不時地會聽到一些輿論，企圖為白色恐怖時期政府的手段開脫，原因是「那些人真的是共產黨，會幫中共打台灣，本來就該抓起來。」林傳凱老師表示，二二八事件的衝擊加上戰後的土地政策，讓許多人對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失望，難免想要從左派的政治思想中找尋出路，一些在小學執教的老師，看著因為經濟狀況而輟學的學生越來越多，因而同情和左傾也是可理解而自然的事。然而，政治理念、意識形態就和宗教信仰一樣，不是終身不變的，更大的可能性是，隨著人生境遇和時代變遷，我們會調整立場、想法和觀點（君不見當今政治人物都能轉換立場加入與原本理念相左的政黨了）。如果當年政治案件中的受難者能活下來，他們或許仍會堅持左翼思想，也或許、更可能地，會重新審視台灣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。而這改變的前提是，他們



沒有在那滿懷理想熱血的青壯年便被奪去性命，才能夠親身經歷社會和歲月的變化。

既然來到與作者面對面的現場，必定會幸運地聽到一些沒寫進書中的精彩內容。林傳凱老師最後也分享了一些有趣的觀察和經歷，例如某位本土企業家常雇用政治犯為員工，讓這些出獄後的「異議份子」不至於生計沒有著落；另外一位企業家，生前常請幾位政治犯朋友聚餐，席間偶然會說，自己年輕時也曾經對左翼思想相當嚮往，甚至一度想要加入地下組織，只是一直找不到門路

而作罷……從這些故事，可以想見當時台灣社會中，即使是政經關係良好的大老闆，對這些政治犯亦是普遍同情的，但對大眾而言，被箝制的言論自由和被監控的恐懼之下，只能緘默以求自保。

分享會結束後，立刻到櫃檯抱了一本書結帳，身為在成大工作將近十年的職員，拿到書自然先尋找是否有成大師生的案件。翻開目錄，赫然看到「成功大學，副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王幼石」。沒有參加地下組織、沒有潛匪紀錄，也沒有發表政治評論或任何形式的「思想叛亂」（當然思想被視為叛亂行為本就荒謬至極），但在那個時代，幾個加油添醋的線報便足以將人入罪，就算只是對政府禁書令稍有牢騷，或對共產黨表現出一點同情，都能被寫成想像力過於豐富的自白書。被同案倖存的政治犯形容在獄中「特立獨行」不與人來往、「像傳統士大夫」的王幼石主任，最後竟被羅織了參與「軍人監獄再叛亂案」的罪名，40歲時遭到槍決。

雖然任職於校內的博物館，照理說應該有著近距離接觸熟悉校史的優勢，但在看到這本書之前，我從不知道本校圖書館曾經有這位王幼石主任，也不知道他是成大（當時是省立工學院）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捕師生中職位最高的一位。檔案或許已經出土，但故事需要有人敘說和傳誦，才得以進入人們的記憶，也才能讓歷史不被輕易抹除或遺忘；感謝有這本書，從每個人都能夠感同身受的校園生活經驗切入，讓我們能夠同理在那個初社會化、企圖在校園中獲得同儕和師長認可的青澀年紀，卻必須面對國家威權壓迫的處境。我們能夠做的，或許就是回到人類尚未發明文字和網路時的本能，繼續把故事說下去，讓它們回到地方史和校史中，成為更多人的記憶。